

贵州工商史料汇编

第 三 辑

中国民主建国会贵州省委员会
贵州省工商业联合会

编 者 的 话

为便于研究贵州近代工商经济史，我们收集了贵州省、市、州、县各级政协编印的《文史资料选辑》中有关我省工商企业的文史资料，编辑成《贵州工商史料汇编》。这些资料都是原工商业者的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的记载，为研究我省工商经济史提供了基础性资料。

本书收集的资料，除有部份作了文字订正外，没有作任何修改。如有错误，请批评指正，并欢迎同志们为我们撰写和推荐有关贵州工商企业情况的历史资料。

中国民主建国会贵州省委员会
工商史料小组
贵州省工商业联合会

第三辑

目 录

我贩运“黔土”外销的经过·····	伍效高 (1)
泰丰字号运销鸦片的经过·····	胡蕴植 (18)
我所知道的贵州特税·····	戴子儒 (24)
特税的征收机构·····	双 楫 (30)
贵州盐务见闻·····	周荣祥 (35)
贵阳解放前的食盐供应·····	吴建民 (44)
盐行街与贵州盐务·····	邓庆棠 (47)
解放前贵州运销川盐概况·····	吴鲁钦 (62)
“大业公司”·····	(78)
民国时期思南盐业·····	(82)
话绥阳旺草“沛苍盐店”·····	陈锡昌 (88)
解放前贵州的烟草种植与卷烟工业·····	兰 天 (98)
贵阳南明烟厂追忆·····	刘裕远 (111)
新生烟厂概况·····	谢楚贤 (116)
清水江流域的杉木交易·····	廖耀南 游芝升 (125)
安顺被淘汰了的一些行业·····	吴发元 (151)
安顺“四大号”内幕·····	戴子儒 (161)
绥阳硫酸厂概述·····	李如钰 (179)
安龙县民国时期工业概况回忆·····	黄明楷 (184)

思南工商业回顾·····	罗肇础 (190)
沧桑巨变话都匀·····	郭宗良 (198)
旧社会经商漫忆·····	郭宗良 (204)
思南德昌火柴厂·····	(210)
安顺三刀简史·····	薛士贤 程国经 (213)
绥阳县银丝手工盐面考·····	王裔彬 (218)
思南名产——甜酱瓜·····	颜世龙 (224)
匀酒——都匀名特产之一·····	张上寿 (226)
独山特产盐酸菜的来历及其制作方法·····	邓善渠 (234)

我贩运“黔土”^①外销的经过

伍效高

自晚清以迄民国，贵州向为国内重要产烟（鸦片）之区。而一般农业生产不被重视，十分落后。历届反动政府，对烟毒时禁时弛，烟价时涨时落，涨落之间，大可操纵获利。故商贾贩运，趋之若鹜。在解放前的数十年间，尤其是抗日战争以前，贵州商业经济，烟毒运销，竟居主要地位。

贵州鸦片，向以西路产量最多，质量最好；盘江各属，尤为著名。次则普定、镇宁、织金、郎岱所产也称上乘。以上各地所产鸦片，外销时通称“坝货”^②，而以安顺为统一集散地。故当时安顺鸦片买卖商场，冠于全省。

我于一九二一年起至一九三九年，曾以安顺为基地，通过各种渠道，经营鸦片外销前后达十八年之久。现将当时亲身经历简述于后，揭露反动政府不惜以毒害人民的鸦片，进行搜刮，同时也是对我个人罪恶的清算。

一、我贩运“黔土”外销的开始

我运销“黔土”始于一九二一年。我原来是做山货生意，连年贩运猪毛、牛皮、竹参等到广州销售。一九二一年

孙中山先生在桂林组织北伐军大本营，任谷正伦为中央直辖黔军总司令。谷是安顺人，深知西路烟土行情，乘机大做烟土生意；并派军需官陈子良来安顺押运烟帮，收取护运费及烟税。当时鸦片开禁，烟价下跌，并闻秋后又有禁种之说，烟价势将上涨。我便把自己本钱两千多元全部购买烟土，还高价赊进了四、五千两，搭入谷正伦所属的烟帮，前往广西桂林销售。不料途中谷的经理人其胞弟谷纪书和堂弟谷兴乔大闹意见，我和同行熊福乾的货，原来搭在谷兴乔方面，深恐到桂林被谷纪书扣下；于是就在古州（即榕江）将货提出发售。但当时才知禁种之说只是谣传，为执政者以禁种为名，提高烟价，以便抛售他们的存货。因此烟价一度上涨，随即回跌。加上当地交易尽用两广毫洋，由于货价跌，银水低（十二毫几才能折合大洋一元），我不但本钱亏光，还欠了赊货期款四百多元。只好把家里老业十八石稻田全部出卖，得约一千零几十元，除还债外，尚余现金六百多元，再做鸦片烟生意。

我第二次外运“黔土”，是在一九二二年。当时因为本钱不多，先代杜斌丞（贵阳帮）在普定办过两次货，共一百七、八十担（每担一千两），代办费每担三元。加上自本零星购进，按市价已获利二千多元。至当年新货上市，又代杜办过一百担，经营到同年八月，我已有了十多担货的本钱，便又开始了第三次贩运。

当时听到百色价高，我除自有的十多担货外，又向廖凤岐（普定人）赊货四担，并联合聂羽连（普定人）、伍凯堂（广东新会人，在安顺有家）组织开帮。虽然听说去百色路途险峻，气候不好，普定三棵树曾有十八个人去过百色，回

来死了十六个，未死的两个还在打“闷头摆子”（恶性疟疾）一直未愈。但因利之所在，仍决心前往。进入广西后，路上确不好走，且遍地土匪，随时有被抢劫的危险。贞丰县板城（现属望谟县）还有个自称司令的王海平，独霸一方，般过板城，要经他检查、过秤，收“保护费”。如无现金，就以烟土折缴。货到广西百乐或百色以后，还得等他所收的现货先卖高价。从板城船行下水到北香，再转上水，经红水河到百乐，再走七天陆路，才到百色。最难走的是百乐到路城一段，内有两天要在一丈多高的巴茅丛里通过，上不见天，下不见地，遍地霉叶烂草，全不通风，臭气扑鼻，十分难受。其间还得自带锅台、帐篷，夜宿荒山，蚊叮虫咬，要防野兽袭击，毒蛇伤人。无怪那时俗话说：“过了八渡河，带信回家嫁老婆；走了三道沟，阎王把命勾”。说明鸦片商人，为图暴利，真是连命都可以拚上。

到百色时，烟价每百两一百二十八元，除去成本运费等五十多元，每担货净赚七百元。将货款由香港调昆明转到贵阳、安顺，还有汇水加一的收入^④。我将货物售出后，参加了振华福号。该号集资两万元，我入股一千元。公推许荣丰（湖南衡阳人）、刘子隆（广东灵山人）分任正、副经理，我任监察。通过振华福号的业务，我更加熟悉了广州、梧州、南宁等地的烟土行情。为以后大量贩运烟毒打下了基础。后来百色烟价每百两跌到一百零几元，我又买进，通过振华福运往梧州，赚了一千多元。再等杜斌丞货到，我又代他经手，他一共获利约两万元。但杜此去染疾，归途死于镇宁。

我从百色转到昆明，遇见邓羲之。当时隆兴公司总经理

刘若愚正在组织开东兴帮，邓羲之约我和聂羽连合伙搭帮，我和聂将货作价，各出资一万元，邓出三万元，由我与聂二人同往售货。

这次去东兴，路途也非常困难。烟土装箱用的是二十五斤装的煤油桶，每桶装三百三十两，封口焊牢，每担两桶。交滇越路火车运到大树堂下车，再经越、桂、粤交界之处，绕道前进。一路上多是小道、河沟，须将货担由水里拖过，一共历程二十多天。我们则按时乘火车到海防，再转乘小火轮，沿着海边到越境的芒街，隔江就是东兴（属广东防城县）。东兴虽只是一个市镇，但交易很大。办货的多是香港、厦门、汕头、北海等地的商人，每笔交易都在十担以上。用的是越币交易，叫做“法纸”。来客的货款，都是汇到海防。东兴售货不交钱，货交三泰利行经办，售完后才到海防兑价，将“法纸”带到昆明。这次生意的红利约为百分之五十五。

我于一九二三年八月初回到普定。这次去百色、跑东兴，历时十一个月的时间，我一共获利一万二千多元。

二、我参加恒兴益的经过

恒兴益位居安顺四大号（依次为公合长、天福公、恒丰裕）之首。于一九二一年集资，一九二二年——一九二三年试办，一九二四年正式成立。主要股东丁纯武、王志羲、邓羲之等均为普定、郎岱乡下财主，在禁烟时期各有大量鸦片存放，开禁后高价出售，拥有雄厚资金。故集资时资金即达二十万元，正式成立时增加为四十万元，至第二届股东会更积

累至一百万元。经营范围，表面上虽是做汇兑、花纱、匹头、百货，但大宗的还是鸦片。

恒兴益所以发展如此之快，除了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给予有利条件以外，也有其一套适应当时情况的经营方式。对内来说，按成立时所定章程规定：每三年一届，结大账，总计盈亏；每年结账一次，发付股息八厘。还规定：结大账时，提出利润百分之三十为职工奖金，其中经理人员享受最优，总经理、协理及外庄经理，一共分为四十多股，总经理五股，外庄经理少为两股半，多至三股半。分届结算，所分红奖，最少的得到六千几百元，最多的达一万七、八千元。章程另规定：凡在号任经理职务的人，必须有五千元以上的投资，促使其认真负责，以利业务；又可防止亏空，便于赔偿。因而业务盈亏，各总、分号经理人员均属利益攸关、不敢怠忽。

对外来说，则挟其雄厚资金，联络排挤，巧取豪夺。当时安顺四大号均各出有兑条，作周转金，进行买空卖空。一九二六年，恒丰裕改组，邓子英（安顺巨商帅灿章的师傅）股本退出后，资力最弱，声誉最低。而另一方面，邓羲之和公合长经理彭幼伍是亲家，丁纯武和天福公的席绍庭过去曾在瓢儿井同做盐生意，有交情。于是三家勾结，想尽一切办法，要把恒丰裕挤垮。有时在市场上广收恒丰裕的即兑条，派人去挤兑；有时调查到恒丰裕忙款，要售期票，就几家联合削价，使其不能售出；还有，市场上如有賒期生意，就暗放谣言，使大家对它不信任。总之，当时商场上的竞争，的确是丑恶的，完全是认钱不认人。而且，商号内部各庄之间还备有密码、代号（如把棉纱说成是棉布等），通过电

报局，散发电报行情。有时还要贿赂电报局报务人员，透露从长途电话中听到的行情、市价。为了保密，密码、代号也经常变换。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如何获得尽可能多的暴利。

我于一九二三年八月回普定后经丁纯武邀约加入恒兴益。当时恒兴益号还在试办期间，但业务范围已从原来的重庆、上海、昆明扩大到汉口、洪江、百色、南宁、梧州等地，并在这些地方增设分号。因为这些地区烟土销量很大，利润也厚。同时还有纱布进口，可由广州、香港购入；调款出入，更是少不了对香港的联系。由于我对两广业务熟悉，又有振华福号的关系，随时得知南宁、百色行情，故决定由我出任百色分号经理。

我去百色之前，先到盘县办了二百九十担烟土运往百色，成立分号。不久，南宁分号也由我负责。照章程规定两庄分红应为二股半，以后我独得三股半。在百色约一年，我就到南宁添设分号。当地交易，是以棉纱为大宗，而且是做赊期，半年交款。赊纱运黔，变款买烟土运去，销售完毕，还有空余时间流转资金，通常利润，达百分之四、五十。我在南宁经手约棉纱，每年至少一千至两千大包（每包四十股）。二十支纱的单价，约为每包二百四、五十元。赊期纱价以东毫计价，在佛山交款；现款现纱，则用西毫（东毫、西毫是广东、广西各别通用的货币）。匹头交易，多是现款，或一月、二月的短期。约计当时每包纱运到安顺，几乎可买一担未经加工的鸦片毛货。这时间内，恒兴益每年运销广西的鸦片，不下两、三千担。连同运销湖南、湖北的（包括滇货），总计不少于四、五千担。而且做广西的生意，由于有赊期，不

要什么本钱就大获其利。

当然，经营中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一九二六年我在南宁时，广西出兵参加北伐，军阀白崇禧乘机敲诈，向各商号筹借开拔费。大号如孔德记、恒兴益要各出一万元，小号则几千、几百不等。当时没有现款交付，我和孔德记经理李清甫请减半数，未获允许。许多商人都躲藏了。隔了一天，白崇禧把我和李清甫传去当面说：“如不交钱，就要拘留。”结果被拘留了大半天，才放出来借款交钱了事。

一九二九年蒋、桂军阀内战，滇、粤、桂军阀混战了一年多。当粤、桂军阀在桂平对峙时，船只不能通行，许多商号怕蚀本，都收手不干了。但恒兴益的税款是由沪、汉调拨交付的，不仅存货未售，还趁货价回跌，购进一些散帮来货。我更认为时局虽然恶化，税款他们总是需要的，于是冒险继续经营。先在邕、梧之间，往返数次；并到横州、百合、贵县、玉林等地调查行情。隔了两、三个月，梧州没有货到，特税^①全无收入。我乘机 and 粤、桂税局交涉，找到了分段接运，在桂平换船到梧州的门路，把恒兴益在南宁的存货全部运到梧州，卖了每百两二百二十八元到二百四十几元的高价，每百两得利润三十多元。

这次存货启运前，滇军已由滇南入桂，准备进攻南宁，启运完毕，滇军已到同正、扶南。我于一九三〇年二月二十六日离南宁下梧州，二十八日滇军就进入南宁，为时只差两天。我随即取道贵县经宜山回黔。此后我便放弃了两广的生意，另到洪江、汉口寻找市场。

一九三四年，桂系集团和蒋介石保持和平对峙状态，黔、桂鸦片运销逐渐恢复。但恒兴益的内部矛盾却逐渐发展了。

一则派往广西经营的多是邓羲之的子侄（邓若符、邓泽光、邓泽民等），他们一到就成立了怡和永独自经营，为别的股东所不满；再则大股东王竹斋要退股回家；而且当时抵制日货的浪潮正在高涨，贵阳百货门市部受了相当的损失。到一九三五年第三届结大帐期前，邓、王两大股东就提出拆伙，决定凡在外庄投资出去的资金，划归经手人应分的股份（例如我经手投资隆大公司的股金就划归我所有），此外的存货及产业，却作价摊分，大股承受资财，小股分现金。此后恒兴益就由丁纯武独自经营。

我离开恒兴益后，就以所经营的隆大和大东在安顺设庄续办特货。同时还代理潮帮、广州帮、上海帮十二家特商在黔的鸦片购销业务，并与贵阳赖永初、赖贵山弟兄开设的赖兴隆、宏大等号互相勾结，追求暴利。（详第五段）

三、烟商和地方军阀的勾结

过去有一段较长的时期，贵州地方军阀发生内哄，割据称雄，地方秩序很不安定。鸦片运销冒险性大，投机性强，必须依靠地方军阀，才能发财致富。而地方军阀要招兵买马，扩充实力，也要依靠特税作餉源械款。表面上虽偶有利害冲突，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一九二五年夏彭汉章任贵州省长时期，他部下驻扎安顺的几个旅长，除征收特税外，还公开护运鸦片，收“保商费”；包办走私，收“保护费”。甚至在各家商号上打麻将，也要向商号上借赌本，动辄几百元，输了不还，赢了拿走。各商号也乐得如此，只要应酬得好，不但可以减少麻烦，还可得到他们的扶持和包庇。这些军阀巧

取豪夺的方式及所得的多少不同，当时曾有饱马（怀仲）肥杨（其昌）饿老张（绍先）的说法。

到一九二六年周西城执政，为了繁荣鸦片运销，增加特税收入，采取了巧妙的办法。当时曾有一个广西烟商到独山买了三千多两鸦片，运到贵州边境遇劫，该商就拿了通关票（上载原售主上税是五千多两，除零星售出一些不要票的以外，卖给这广西烟商的只有三千多两）到贵阳报案。结果周准照票载上税数量全部现款赔偿，责成地方官转饬地方人摊认。这个商人反而赚了钱。消息传到广西、湖南，湘、桂商贩来者更加踊跃，挑了大洋来买烟者每帮不下百把挑，形成“黔土”外销的极盛时期。每年鸦片外运达四、五万担，特税收入达五、六百万元。同时，周西城为了笼络下属，还把一些通关票送给他派驻省外的代表（杨秋帆、钱同宣就曾在湘、桂两省当过代表）。这些代表自己不买货，把票证转售给商人，或假立名号来利用这些通关票进行投机活动。在商人方面，当然也乐得用低价购入这种通关票，既降低了成本，又应酬了官僚，实为一举两得。

一九二九年，李进进入贵州做了短期的临时政务委员会主席。当时军饷支拙，为了筹款，就将通关票期前卖给各鸦片烟商。各烟商买得后，有的因一时忙款低价转售，到向外开帮时又复回涨。动荡之间，小商号被整垮了，只有大商号财力雄厚，票、货齐备，从中大获暴利。

贵州军阀统治时期，特税征收机关前后名称不一，有时叫特税局，有时叫筹饷局，有时又叫饷捐局。历任局长有杨季襄、杨德纯、马空凡、谢根梅等人。纳税额最初为每担一百元，以后逐渐增加到一百六十元。有的驻军部队包庇出境，

只收钱不填票，每担减为一百、八十、六十元不等。零星散帮，自更乐于接受。

除贵州外，其它省区也无不如此。湖南鸦片最大的集散地是洪江，设有特税局及监理处。凡属贵州去货，须先在该地完税，才能运往常德、宝庆、长沙、衡阳以及江西等地。一九二九年恒兴益曾去过几帮，约在千担以上。因去货多是“整饼”，货色稍次，又加嵌有纸筋，不能久存。洪江分号经理周德宣积压了二百几十担，越久越坏，难于脱手。当时贵州军阀王家烈正做湘黔边区“剿匪”司令，驻扎洪江，还有洪江伪特税局长刘宗祥、贵州伪驻湘代表钱同宣我都认识，一向关系很好。恒兴益把我从广西调去处理这批存货。我到后和他们互相勾结，采取各种办法，半年就处理完毕，结束了前后三年的帐务，而且不断还有去货。

在洪江不到一年，我又调到汉口。当地原有二十一家土膏行，垄断了鸦片生意。川、滇、黔的特商来到，都要听他们支配，还时时塌帐。为了摆脱他们的操纵，我联络西南各帮及上海帮，以保证税收为名，多次向当时伪禁烟督察处处长黄振兴提出申请，坚持调整土膏行，并拟定方案，除原有二十一家以外，新增四家，即川、滇、黔及潮州四帮各成立一家。滇帮取名“云兴”，经理杨显成；川帮取名“断蜀”，经理白少玉；黔帮取名“隆大”，经理伍效高；潮州帮取名“岭东”，经理郑慎之。资金各筹十五万元，验资后开业。这个方案虽遭到旧土膏行的强烈反对，但督察处为了争取特税收入，始终大力支持。一九三二年春，四家先后验资成立。此后除零星散帮外，成批去货都不再落入旧土膏行手里。而且新增的四家，都是买卖双方协作成立的，可以直接交

易，例如岭东的最大买主是上海帮，上海是长江下游最大的销场，其次才是浙江、安徽、河南、江西、湖北等地。更加货款收付不再经过旧土膏行，他们不能再套用“金”。这又是官、商勾结，互相利用的一个明显例子。

四、蒋介石直接控制鸦片运销 为反革命围剿筹集军费

一九三三年时，蒋介石正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进行反革命“围剿”。他为了筹集军费，便在鸦片烟上打主意。把全国的巨额特税集中起来，形成以他个人为中心的一个独特的特税体系。当年夏季，首先在南昌行营成立了十省禁烟督察处，专管豫、鄂、赣、皖、闽、湘、苏、浙、陕、甘等省的特税收入。以后逐步开展，督察处所辖不限十省，分支机构，遍及全国。督察处对特货实行统收统运，只许公运，不许私运；不受各省市、各院部的管辖，不受任何法令的限制，直接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命令行事。

同年秋季，蒋又派人到汉口，号召官商合资成立农民银行，召集当地二十五家土膏行开会，勒令每家投资两万元，共为五十万元，另由政府拨款五十万元，两共一百万元，作为资金。威逼之下，新增的四家被迫承认，而旧有二十一家，确实现金无着，并无结果。经当时督察处长李子宽向蒋请求，才决定先由督察处拨款成立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规定该行款项不能充作一般的军政费；只专供蒋介石的特别用途，并规定此后所有特税收入，必须全部向农民银

行缴纳。当时每担特货的税额是二百元，另增附加费百分之十。我记得，在这次附加税中，每担就提有五元修武昌监狱，总计每年不下一、二十万元，这是全国有名的最大监狱。

在各地成立禁烟督察处的同时，随即成立了农民银行的分支机构。不但专收特税，还对鸦片烟商开展抵押、贷款、折现种种业务，多方面积累资金。鸦片烟商如果一时无力缴税或周转不灵，可以现货向农民银行抵借，押款额照市价六至八折计算，利率月息一分以上，还得取具两家以上殷实铺保。到期（二至三月）不赎，即将押货拍卖（以上规定，均见伪行营经字第七三一号指令）。通过这些办法，农民银行的资金便越积越多，不久即跻于全国四大银行（中、中、交、农）之列。而按其实际，无一不出自鸦片烟土。大家称之为“鸦片银行”，真是一点不错。但这还只说明了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其搜刮资金，专供镇压革命的角度来说，它又是个地地道道的“反革命银行”！

督察处下设有公栈 到货必须归栈、完税、贴花，否则即以私货论，一律没收。为了加强查缉私运，公栈下设有缉私团，装备、待遇均比一般军队为优。例如汉口缉私团是一九三四年成立的，团长邱开荃是蓝衣社头目，所辖达四千人左右。还另外成立了宪兵部队三个团，协助缉私，分驻洛阳、沙市、毫县等地。在贵州也有缉私部队两营。记得当年旧历除夕，滇、黔两帮，运货一千多担，由洪江经常德，换“大有”号轮船运到汉口。这批特货在启运之前，曾由洪江禁烟专员办事处填发护照与运单，缉私团到江岸检查时，则因护照与运单日期相差一日，便硬说：“这是私货，特商想利用年关偷运。”借此准备没收提奖。这场官司在南昌行营

打了半年多，结果判决：“敢于私贴伪花，每担罚金二十元。”这就是当时有名的“伪花案”。这场纠纷，使许多交易都停顿了，汉口的一些旧公司，更加周转不灵，不得不向农民银行借款一百万元，以作支应。借款成立后经人密报这批借款有回扣，是贪污。武昌行营传讯了新旧公司二十五家的代理人，首先问我，因我们四家公司并未借款，回答并无此事，来保护李子宽。但督察处长李子宽仍然被撤职，换了黄天民当处长。结束了这场“贪污案”。

五、我后期运销“黔土”的情况

一九三五年我离开恒兴益时，贵州成立了伪禁烟督察处，肖觉天任处长。一上台就说特商都是无照经营，违反规章，把鸦片商人抓得“鸡飞狗跳墙”。加以“伪花案”、“贪污案”的影响，搞得滇、黔帮七、八个月无货运汉，特税收入受到很大影响。反动政府为其根本利益，才把肖觉天撤换，改由伪贵州财政厅长王澄莹兼任督察处长以收拾局面。

由于“黔土”长期不能运出，造成黔税锐减，汉口存货将空。而按照当时法令，运货到汉，非有土膏行执照不可，贵州督察处不能擅自发照，这就给我造成了发财的机会。当时我已组织了隆大公司，自任经理，同时我私人户头执有运照，具有由黔运汉的条件。因而伪汉口督察处长黄天民，多次要我以隆大公司代办黔省特货货运。我料汉口几家新公司各有帮口，对黔货插不上手；而旧公司更一无财力，二无信用，不能来黔办货；即使恒兴益有货运出，也非我的运照不可。有机可乘，我便提出了条件：一要给我一定的权力，交